

经济运行机制的哲学思考

Philosophic Thinking on Economic Operation's Mechanism

张华夏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广州 510275)

现在,为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改革浪潮正进入一个新的热点,人们谈论的普遍话题是如何面向市场,如何经营股票,如何引进外资,等等。正当大家热衷于市场营销学、决策管理学、国际金融学、股票投机学之时,对经济运行机制进行一种纯哲学的思考似乎是很不合时宜的。不过,哲学工作者的兴趣、良心和方法却迫使笔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研究,对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机制作自然观的考察,对各种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学说的前提、模型和结论作科学哲学的反思,而这种自然观的和科学哲学的考察之间又是紧密相联的。

一、经济运行机制与麦克斯韦妖

如何达到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与调节,这是国民经济运行机制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有点象统计物理学中寻找一个想象中的麦克斯韦妖,它对抗自然界的由有序走向无序,由规则走向混乱的熵增原理。大家知道,统计物理学的创始人之一,麦克斯韦研究了对抗熵增趋势的机制,他设想有一个十分灵活的妖精,他操纵着 A、B 两个充气小室之间墙上的一面小窗。当看到有很快的分子迎窗而来时他打开窗户,当来的分子是慢速度时他将窗门关上。这样 B 室逐渐变热而 A 室逐渐变冷。于是,过程便从无序走向有序,从混乱走向规则。可以说,这是运动着的分子的“最优配置”。当然,不损耗能量的麦克斯韦妖是没有的。不过,现代分子生物学告诉我们,为了维持生物序,酶分子行使了麦克斯韦妖的职能。例如,由于生命的需要,细胞必须维持其内外之间钾或钠离子的浓度梯度。正是某种酶驱动了这种逆梯度的离子运输。当然,这种机制需要消耗自由能,但所耗甚少,而它却维持了生命的高度有序性。

对于经济生活来说,我们也面临熵增的威胁,为了建立合理的、优化的或有序的经济秩序,是否

存在或是否需要一个经济学上的麦克斯韦妖呢? 200 年前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认为,市场导致供求的平衡,它就是调整经济生活,调整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合理配置的“麦克斯韦妖”。当然,他没有使用这个词,但他却用了它的同义语。他说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可达到完全竞争经济中的均衡和最优化,置身于经济之外的立法者不应干预这个自然的过程。可是本世纪 30 年代发生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说明这只“看不见的手”不灵了。于是正好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当机立断,改变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实行产品调拨的计划经济。几个五年计划就使国家工业高速发展。他似乎找到了调整和优化整个经济生活的麦克斯韦妖,这就是后来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所说的“苏维埃国家的特殊经济作用”。也正是在 30 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及货币的一般理论》(1936),也猛烈批评自由放任的“看不见的手”,也认为自己找到了经济发展的麦克斯韦妖,这就是“政府的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包括发行大量通货,增加公共投资,等等。其结果,果然导致了第二次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一批国家的空前繁荣,被人称为“凯恩斯革命”。但是,长期运用这种政策,结果又产生通货膨胀,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国际通货危机等新的严重问题。现在,计划经济不灵了,凯恩斯也不灵了。回过头来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看待那只“看不见的手”呢? 谁找到了经济运行的麦克斯韦妖? 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地球上的经济大系统,都是远离平衡态的耗散结构。它是能够通过自组织而不断进化,从无序到有序,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因此,调节经济生活,使之达到持续、稳定,达到最优化的客观机制或客观可能性是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发现它,利用它,掌握它。

二、标准计划经济模型和“全能的神”

计划经济是否执行了麦克斯韦妖的功能,成为

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的机制？这里，我们严守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抽象法这种科学方法论，首先不去讨论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也不去讨论文革前的中国计划经济模式，而是讨论一般的、理想的或标准的计划经济模型。只有这种最少受干扰的“纯粹形态”和“标准理想状态”的讨论才能弄清计划经济的实质与前提条件，以及它们在可行性上会碰到一些什么问题。

假设有个X国，在革命胜利后建立了标准的计划经济模式，这个模式或经济体制有下列五大经济特征和哲学特征。

五大经济特征是：

1. 在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建立之后，即行取消商品与货币。在这个国家人口稠密的大都市里，用黄金建造公共厕所，以表示人们对金钱的藐视。（《马恩选集》3卷441页；《列宁选集》3卷768页、4卷578页。）

2. 一切物质资源和劳动资源直接由国家统一调拨，个人劳动直接地当作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各生产单位、事业单位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供应到那里，从那里获得供应，由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用行政指令的形式来规定。计划就是法律，强制执行。

3. 这些遍及全国每一角落的行政指令与计划是依一定时期全社会的政治经济任务以及每个成员的物质文化需要制订的，它统筹宏观与微观资源，以最优化的配置，达到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物质需要的目的（《斯大林选集》上卷569页。）

4. 生产效率、产品调拨以及个人劳动在共同劳动中所占的份额的计量单位是劳动时间。价值、价格不但不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而且不起经济核算计量尺度的作用。（《马恩全集》23卷93~95页，《马恩选集》3卷348页。）

5. 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企业是国家的下属单位，无经济利益的独立性。它的投入、产出与补偿（工资福利等）全由国家包干。整个国民经济就是一个大工厂，一部大机器。（《列宁全集》3卷258页。）

与此相适应，标准计划经济模型有下列的哲学特征，即本体论的、认识论的和价值论的特征：

1. 在计划经济中，人类第一次真正脱离了动物界，不再受动物界的和市场经济的生存竞争和优胜劣汰的法则支配。（《马恩选集》3卷323、458页。）

2. 在计划经济中，人类从“云”状的王国进入“钟”状的王国。在商品经济社会，生产者不能预测自己产品的结局，因而也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任凭异化力量和偶然性的摆布（《马恩选集》4卷506、171页），我们生活在一个不规则的，充满偶然性的，非决定性的“云”状世界里。计划经济使我们走出了“云”世界，进入一个高度有规则的、高度可预见的、决定论规律占支配地位的“钟”状王国。这

时，研究“云”状经济现象的“政治经济学终结了”（布哈林）。

3. 在计划经济中，人们从必然王国进入了自由王国。由于消除了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盲目统治以及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人们进行社会行动的动机便在主要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预期的结果。（《马恩选集》3卷457、458页。）计划的预期和计划的结果之间的日益吻合，使国家能对经济生活作出超前的开环控制。

4. 在计划经济中，个人利益、单位利益以及全社会利益完全一致，人的伦理道德可能达到这样一个高度，无需个人利益、单位利益的驱动与压力，便能自动自觉地、主动忘我地工作。

5. 在计划经济中，国家是一个全息机关，它通过其计划网络获得全社会的一切经济信息，并准确地加以处理。

最后两个特征最为重要，它代表了计划经济的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特征，也是计划经济存在与运作的基本前提条件，所以前者又称为计划经济的全益性原理，即国家集中了，也完全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后者又称为计划经济的全息性原理，即假定国家掌握了全社会经济活动信息。

计划经济的这种全息性、全益性以及全运算的要求，使得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不得不将自己的国家机关看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拉普拉斯妖和麦克斯韦妖，即“全能的神”。如果将拉普拉斯提出决定论时对他的“妖”所提出的要求和标准计划经济模型对苏维埃政府的“特殊作用”提出的要求作一个比较，事情就十分明显。拉普拉斯说：“我们应当把宇宙的现时状态看作是它先前状态的结果，随后状态的原因。假定有一位有超人智力的神明，它能够知道某一瞬间施加于自然界的所有作用力以及组成自然界的所有物体的瞬间位置，如果它的智慧能够广泛地分析这些数据，那么他就可以把宇宙中最重的物体和最轻的原子的运动，均纳入同一公式之中；对于它，再也没有什么事物是不确定的，未来和过去一样，均呈现在它的眼前……不过人们距离这个神明还很远很远。”在计划经济领域里的情况也是这样，由于经济现象的测不准关系，由于计划机关认识能力的限制，经济活动的全部信息不可能获得，也不可能集中，并且全运算是当代世界最大的计算机也无法担当的。计划经济给那些与生产和管理过程没有直接关系的计划机关带来了信息获得、信息传递、信息处理以及合理决策的过重的负担和过分的权力，它是不可能实现的，至少不可能按上述五个经济特征加以实现。结果，全息性原理变成“情况不明决心大”，指令性计划变成主观盲目计划，集中性指导和开环控制因没有市场反馈回路而变成信息反馈不灵，非到积重难返之时不知要糾

正;而全益性原理变成扼杀企业独立自主的生机和活力,最后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于是,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便成了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

可以责难说,上述的研究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抽象。不过它和“理想气体”、“绝对刚体”以及“无大小的质点”的科学抽象一样,现实经济世界以多大的程度类似于标准计划经济模型,它就以多大程度需要一个“全能的神”。

三、一般市场机制与“看不见的手”

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全面的市场经济,政治经济学关于商品生产存在条件的理论发生了改变。最早认为,商品生产的充分必要条件是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后来在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版之后,改为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产品的不同所有者(包括不同的公有制形式)。现在看来,商品生产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只是:社会分工和存在着有独立利益的经营主体。只要承认城市中的企业和农村中的家庭是独立的经济主体,即承认他们的独立经济利益,则执行社会分工的这些经济主体就有一个如何将个人劳动或本单位的个别劳动转化为社会必要劳动来获得社会承认并相应得到补偿的问题。即使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个人劳动或个别劳动都不是直接作为社会总劳动的部分来进行调拨、评价和补偿的。它不能通过直接劳动时间来计量,也不能用平均劳动时间来测量(作这种计量同样需要一个拉普拉斯妖来处理对任何现实的人来说都处理不过来的信息量),而必须通过市场价值来实现。也就是说,经济活动必须通过市场来评价。

市场大大地简化了经济体系运转所需要的信息,并迅速地将信息传递到最需要它的决策人那里。正因为这样,它成为资源平衡或优化配置的有效工具,成为社会化大经济协调运作的方式,成为现代工业世界的中心组织措施。具体说来,它有下列的功能:

1. 资源配置的自动调节功能

由于认识能力的限制与经济过程的随机性,人们不可能获得经济活动的全息。因此,排斥市场的产品调拨指令性计划经济总是以产销脱节、供求脱节为特征。而市场之所以能够成为产销平衡、供求平衡的自动调节器,并不是因为生产者预先得到需求的信息,将生产的数量和质量设计得与需求相一致,而是通过价格信息的反馈,调节经济人的决策与行为,使供求、产销达到动态的,并且常常是波动性的平衡。这个自动调节机制就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执行了经济生

活中麦克斯韦妖的功能。这个调节不是事前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各环节按比例地进行开环的程序控制,而是利用供求之间各种随机的、偶然的不平衡“误差”作为调节信号以防止更大的不平衡的出现。它承认偶然王国是经济生活的本质因素,或如维纳所说的:“偶然性是宇宙本身结构的基本要素。”(《维纳著作选》,上海译文出版社,8页。)市场机制正是利用这个基本要素进行调节,求得统计平均上的供求平衡与资源合理配置。产品调拨计划经济的哲学基础是决定论的开环控制论,而市场经济的哲学基础是非决定论的自动调节论。前者只适用于理想的“钟”式王国,而后者却适用于现实的“云”状世界。所以市场也就成了现代社会资源的基本配置者。

2. 竞争与优胜劣汰功能

在市场经济中,社会经济细胞(即企业)不是按上级行政指令进行生产,而是依市场的变化进行生产决策。价值法则或供求规律的作用迫使企业不断革新技术,革新工艺,革新管理,降低成本,提高服务,以使本企业的个别劳动耗费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否则就会无利可图,甚至关门倒闭。这就是一种压力,一种强制,一种广义的生存竞争和优胜劣汰的权威。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斥之为弱肉强食,宣称它为人们没有脱离动物界野蛮状态的表现。可是评价一种经济体制不应从抽象的道德原则出发,而应看它是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推动技术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本世纪以来,也正是这个法则的作用使得人类创造的生产力超过过去一切时代的总和。正是市场竞争机制推动本世纪的两次工业革命,使过去梦想不到的电脑、自动工厂、机器人等新技术降临人间,科学进步和劳动者的文化素质都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经济学哲学实在应该为竞争与淘汰的机制作出重新的评价。

3. 利益驱动功能

前面讲过,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是它的基本元素或基本单位必须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经济主体;反之,市场承认独立经营者的利益,保护这种利益,使这种利益得到兑现。这就使得利益原则成为企业经济活动的驱动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面向市场,按市场导向,生产的最终目的或结果当然应该是满足社会及其成员无限丰富、复杂多变、千姿百态的物质文化需要。可是企业的直接目的、动力或动因却是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最优化,并以此作为行为的标准。这个物质利益的最高综合指标,就是企业的利润。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根本分歧不仅是调节资源的配置方式上的分歧,而且是如何看待个人利益和企业(单位)利益的分歧。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采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全集》1卷82页。)还说:“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作

为利益表现出来。”《马克思全集》，2卷，537页。）产品调拨的计划经济假定个人利益、企业（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完全一致的全益原则否认个人利益和企业利益的独立性。实践证明，这只是一种乌托邦。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个人利益、企业自身独立经济利益和全社会利益三者都同时得到承认，并在个人利益、企业自身利益基础上将三者统一起来。个人利益、集团利益与国家利益三者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矛盾。通过市场竞争和宏观调节，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协调地取得个人利益、集团利益和国家利益，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

但是，在经济生活的调节与优化方面，我们不但要看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做什么，还要看到它不能做什么。一般说来，市场机制对微观的、短促的、局部的调整有着非常明显的效果，但对于宏观的、长程的和整体性的调控，它的作用往往失灵。人类必须寻找其他的组织措施。

1. 市场不能控制外部效益也不能控制非排他性“共用品”的生产与消费

市场机制本身不能防止或抑制“在外部”对社会无益的经济活动。吸烟危害健康，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应当抑制这种生产与消费，但市场的法则却是求有必应，源源不断地大量地供应这种东西。如果鸦片可以自由买卖，它必然会大量供应的。世界上有许多企业，它的生产与消费过程引起滥用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构成了工业化的一大祸害，可是市场抑制不了它，因为它给社会的危害并没有计入成本，因而也没有提高它的价格。这就是所谓外部负效益问题。如果让市场的机制自发地调节，珠江的水肯定会愈来愈黑。这不是一件小事，市场机制在一定范围里解决了生产与消费的平衡问题，但在更大的范围里不但不能解决，甚至还会导致人与自然界生态平衡的破坏。相反，普及教育，提高公众的素质，发展科学文化，建设精神文明，改善环境，建设各种公共的或福利的设备……开支如此庞大，是不能依靠近视的市场经济效益去推动的。想靠市场的麦克斯韦妖获得这种“外部正效益”，就无异于取消这些事业。

2. 市场调节也不能有效地达到经济总量的平衡和总体经济结构的合理布局。

像重工业、轻工业、农业之间的合理比例与布局，基础工业和加工工业、传统工业与新兴工业之间的合理比例与布局这类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兴衰的战略问题，单纯依靠价格去刺激投资、自发调节是很难及时加以解决的。在这方面，不但需要滞后的市场反馈回路的控制，而且需要政府作出重大判断和决策，作出长期、中期计划，进行超前的宏观调控。当然，这种调控，或者称之为指导性的

计划，并不要求国家直接安排企业的生产与经营，而是通过财政税收政策、货币信贷政策，以及投资分配政策，使用经济杠杆进行宏观预测、决策与调控。现代科学自然观表明，自然界与社会生活的一切事物和系统，都是在宏观与微观协同进化中发展的。国民经济的调控，自然也应该是微观的市场调控与宏观的计划调控协同进行，不过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计划调节为指导。

3. 市场机制不能导致社会的公平分配

市场引进了经济竞争和优胜劣汰，它总是有利于强者而不利于弱者。而在市场中，由于种种因素，强者并不一定是因为他对社会的贡献就有那么大，就应该那么富；弱者并不一定因为对社会的贡献就只有那么小，就应该那么贫。所以，就自发的倾向而言，市场总是要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两极分化的，它的发展是倾向于破坏公平分配原则的。还应指出的是，在存在着全面的市场的条件下，即存在着货物市场、服务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金融股票市场的条件下，在市场利益原则的驱动下，是会促使私有制的发展的，这是摆在中国经济学家面前的不能回避，也不应回避的问题。

4. 市场会导致生产无政府状态，引发经济震荡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市场虽然是一个保持各个生产部门之间比例分工的自动调节器，但这种自然比例并不是预先依照需要量对它们的生产进行调节，而是通过无穷的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这里“偶然性和任意性发挥着自己的杂乱无章的作用”，“不同生产领域的这种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只不过是这种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一种反作用”。（《马克思全集》23卷，394页。）所以市场经济固有着生产无政府状态、供需失衡，以及周期经济震荡的萌芽与倾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市场经济这种内在矛盾和内在缺陷的分析，是基于一般商品的矛盾分析，并不是必然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它也并不因计划经济行不通而失效，问题本身依然存在，只是我们不能简单地通过产品调拨的计划经济来加以解决。凯恩斯提出国家的有效的财政支出以及国家对宏观经济总量的调控等方案曾缓和了市场经济的某种周期性的震荡，但它只是帮助资本主义国家度过经济危机的一种方法，而且这种方法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中也愈来愈不灵。我们的经济日益与世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地说世界市场经济的周期震荡在现在和未来都不会对我们有所冲击。

所以，当代社会与经济发展的诸多重大问题、诸多环境问题、资源有节制使用问题、贫富悬殊问

（下转第20页）

中原因。其实,道理并不复杂。在忽视,至少是轻视创建改革大环境的情形下,只注意改革前锋的突进这种作法,由于基础性支撑力的不足,必定会使改革程度不同地受挫。如果基础性的改革措施尚未先行一步并实际兑现,那么,在这种条件下,直接性改革措施的实施,很容易加重甚至是激化矛盾,并有可能使改革的群体性阻力的负作用达到最大限度,从而付出一些不必要的代价。例如,目前我国社会成员工作与生活环境的社会化程度过低,社会流动程度也很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急于进行单位内职工的大幅度精简,被裁减者一旦离开了单位,则不仅仅是意味着工作的丧失,保障的丧失,而且还意味着日后很难再次寻找到工作岗位。这些,几乎无异于剥夺了被裁减职工的基本生存条件。因此,改革的群体性阻力不能不因之急剧增大,社会不稳定因素不可能不因之急剧增多。鉴于此,要想使改革得以顺利进行,首先推进基础性改革大环境的创立不失为明智之举。就此而言,至少要注意这样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起劳务市场,使职工能够通过竞争选择到恰当的工作单位,不再为日后可能没有工作机会而焦虑;二是超前地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使待业的职工有起码的生存条件;三是优化单位结构与功能,将本不属于单位的保障职能还给社会;四是提高社会流动程度,改革户籍制度以及劳动人事制度。这些方面的问题如果解决得比较好,那么,深化改革的环境便渐趋完备。在这种情况下,再实施一些具体、直接的改革措施,所遇到的群体性阻力无疑会大为减小,整个改革进程也会顺利得多。

第二,把握好改革推进的“度”。即便是改革的环境、条件得到了一定的保障,也不能就认为可以无所顾忌地猛烈推进改革进程。应当看到,由于具体步骤、具体措施的不同,改革进程仍有可能出现两种可能:一是改革进程的振荡幅度较大,总体效果一般;一是改革进程相对平稳,振荡幅度较小,总体效果较好。要实现后一种可能,就必须把握好改革的“度”,即把握好社会的承受能力。要充分考虑

到改革措施的可行性问题,不应奢望改革一蹴而就,跨度不宜过大,切忌过分超前;更不应四面出击,造成声势过大、收效甚微的情形。可以设想一下职工在四面出击、过分超前的改革中的处境:房租大幅度提高,各种补贴被取消,公费医疗完全改革,自己的工作岗位还极有可能丧失。谁能同时承受这么大的压力,若此,矛盾势将激化,改革极有可能被迫停顿下来。正因为如此,在推进改革时,应以“有效性”为原则,当然,这并不排斥在条件具备时,可以进行某些“合理超前”的改革。但这种“超前”性自然是以有效性为着眼点的。

第三,在破除平均主义的同时使社会成员不断受益。不能将社会成员视为被动之物,不能总是要求社会成员承受些什么。必须看到,由普遍原则直接导致的民众的普遍受益性是现代化的一个特征。否则,现代化将会由于缺乏社会公平而不具有完整的意义。缺少社会成员积极参与,改革的活力必然不足。正确的作法应当是,让广大社会成员不断得到由改革和发展所带来的效益,而且,这种效益并非通过“安抚”性、应付性的消极措施获得。特定的现实环境,使人们存在这样一种不正常的错觉:发展意味着要得到些什么,而改革则意味着可能要失掉些什么。这又进而引起这样一种很奇怪的现象,极少有人反对发展,却有不少人在某些范围不赞成改革。究其原因,便是发展与改革有时并没有被很好地统一起来。本来,改革与发展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有时社会成员并没通过改革而相应地直接感受到由发展所带来的好处。这一问题若不妥善解决,改革的群体性阻力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缓解。还需要说明的是,普遍受益性原则同平均主义完全是两回事,它是强调民众积极参与现代化过程,通过自己的劳动付出而普遍得到比较公平的收入,同时加强调节,防止两极分化。总之,破除平均主义与社会成员普遍地不断直接受益这两者之间保持某种同步的关系,是缓解改革的群体性阻力的行之有效的一种方式。

(责任编辑 孙立明)

(上接第6页)

题、科学与教育问题、危机与失业问题,没有一个能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来加以解决。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并不是到处灵验的。除了市场之外,我们需要某种新的组织措施,新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那种认为只要将人们推向市场便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的论点,那种认为先解决效率问题,以后再解决公平问题的论点,还有那种认为只要富起来,其他问题就好解决的论点,都是没有远见的,都不是一种真正成熟的政治经济学思考,因而也都是值得

商榷的。

所以,笔者认为,我国经济学家们在斯大林的“全能的神”失灵之后,不应该只向我们推荐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看不见的手”以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调控”,他们应该向我们提出一套既能迅速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率,又能避免“原始积累”,避免“贫富悬殊”,避免“脑体倒挂”,避免“文盲增加”,避免“环境污染”,避免“通货膨胀”……的比较全面的经济学说,真正找到经济领域的可行的“麦克斯韦妖”。

(责任编辑 冷远猷)